

第六章

粤商在上海的金融活动^①

1930年代，上海已成为全国无可争辩的金融中心，不仅云集了国内众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的总部，同时通过遍布各地的分支机构，对全国各大区域保持着强大的辐射力。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得益于多种因素。首先，上海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通过陆海空交通工具，可便捷地与全国主要商埠保持联系。上海的电讯基础设施在全国居于一流，有利于金融机构的高效运行。上海的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为资金提供了难得的安全环境。此外，作为中国的工业、商业、贸易中心，上海拥有难以计数的工厂和商业、贸易机构，以及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开拓金融业务的机会。

在上海的金融机构中，地缘资本集团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这类主要以同乡商人的金融资本构成的财团，在追求利润的前提下，以同乡商帮为重要客户，大力开展汇兑、放款和押汇等业务，促进了同乡商帮的经济活动，加强了上海与家乡的经济联系。但以往学界对上海的地缘资本金融机构的活动，未作深入研究。例如，众所周知，浙江商人在上海设立了10余家银行，资本雄厚，但作为一个整体，对上海和浙江之间的经济交往，对旅沪宁绍商帮的经济活动起过怎样的作

① 本文曾以《20世纪上半叶上海粤资金融机构与沪、粤、港、南洋间商业网络之关系——以国华、广东银行为中心》为题，递交香港亚洲研究第二届年会（2007年1月）。

用，人们并不清楚。

滨下武志的《20世纪初上海、神户、仁川的海外华人金融网络》是一篇考察金融网络与商业网络关系的佳作，据此文可知，在东亚三个商埠——仁川、上海、神户之间有一个三角贸易关系，在这一由三个国家多个城市构成的商业网络中，华商极其活跃，取得了杰出的商业成就。为适应华商经营的需要，中国山西票号在仁川、神户、东京等地设立了分号，以与上海—仁川—神户的三角贸易关系相适应。^①上海的地缘性金融资本集团与各客商群体的关系，也可作如是观。开埠以后，包括上海在内的沿海沿江通商口岸都迁入了数量不等的粤民，其中上海的广东人口1930年代已达到10万。沿海贸易和海外贸易是旅沪粤商的重要职业选择。旅沪粤商主要从事上海与华南、上海与香港、上海与南洋的进出口贸易，他们从华南组织纱绸、桂皮、爆竹、葵扇、土糖、陶瓷、烟叶、土布等输入上海，并经上海转输长江中游及北方口岸。从南洋输入上海所必需的工业原材料以及大米、水果等，同时从江浙皖等地采办各类杂粮，从上海采办纱布、卷烟、日用工业品输往华南、香港、南洋。上海与华南的主要商埠广州、汕头以及香港、南洋的曼谷、新加坡等地之间有一个由联号和乡情联结起来的商业网络。

为同乡商帮提供金融服务，是上海粤资金融机构的业务重心，广帮银号、潮帮行家以及粤资银行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其中国华银行和广东银行的表现更为突出。1936年广东银行清理后复业，宋子文明确宣布广东银行将追随同乡商帮，为之提供服务。以后又一再表示广东银行是一家为广东人对外发展服务的银行。国华银行则反复宣称，本行的工作重心是吸引侨汇。为兑现诺言，国华银行和广东银行通过在广州、汕头、厦门等埠设立分行，在南洋设立大量委托代理机

^① 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构，建立了一个金融网络，从而适应了同乡商帮贸易活动的需要。

一、广东人在上海的金融势力

上海开埠后，大批岭南人北上寻找商业机会，凭借勤奋和商业智慧，粤商逐渐成为上海最有势力的商帮之一。粤商在上海的投资领域，长期集中在沿海贸易和进出口贸易、棉纺、环球百货、酒店餐饮等行业。粤商对金融业的投资规模虽然不大，但仍有相当规模。据初步研究，上海的粤资金融机构涉及银行、保险、信托、钱庄、银号、典押等门类，至1930年代，粤资金融机构有银行4家，总部设在上海的2家。钱庄30余家，银号近10家，保险公司8家，信托公司5家，典押数百家。

粤商是最早涉足保险领域的华人商帮。据徐润自叙年谱回忆，早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粤商就筹资开设了仁济和保险公司。^①1930年代，上海的粤资保险公司达到8家，即仁济和、联保水火、联泰水火、永安人寿、永安水火、先施保险置业、先施水火、先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除仁济和以外，其余几家公司的总部均设在香港。它们的特点是分公司遍及东南亚及华南各埠，上海是其中的一个点。如联保水火险公司的分公司12家，6家设在海外，这和上海其他华商保险公司有很大不同。^②先施和永安是两家大百货公司，实行多元经营，都设立了银行和保险公司，在上海的金融市场十分活跃。^③

① 《清徐雨之先生润自叙年谱》（一名《徐愚斋自叙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

②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保险业调查资料》，档号Q275-1-1823（2）。

③ 据调查资料，永安人寿保险公司1938年赢利125 763元（连1937年盈余滚存），对主业是一个补充。

信托公司的业务包括证券买卖、房地产经营和银行业务，涉足范围广，经营灵活。信托公司这一金融机构形式进入中国后，渐为华商所仿效。粤商在上海设立的信托公司，有生大信托公司、中国信托公司、上海信托公司、华侨信托公司、华丰信托公司、华业信托公司。

生大由粤商林炳炎创办，经营银行和信托业务。银行部经营定期活期存款、往来存款、抵押放款、国内外汇兑。信托部经营各种信托存款，代理证券物品买卖及经营、房地产买卖及管理经租等。^①华丰由韦伯祥、郭礼安等人创办，资本为国币 50 万元。^②华侨信托公司由陈紫培、梅其驹、郑颂尧等人创办，额定资本 100 万元，实收 50 万元。^③华业由谭敬等发起，资本为国币 100 万元。^④在上海的信托业中，粤资公司均以资本雄厚、经营稳健称。

钱庄是中国本土传统的金融机构，数量多，在机构林立的上海，有相当影响。浙江人在上海钱庄业一家独大，约有 50 余家。粤商开设的钱庄数量位居次席，至少 35 家，仅潮州土商以经营鸦片所得设立的钱庄就有 33 家，资本总额 206 万元。^⑤潮商所设钱庄数量虽多，但往来客户同乡商人不多，其原因是，潮州土栈钱庄的经理无一例外均由绍兴人担任，营业素取稳健主义，故不甚愿与以烟土贩售为主业的潮商发生关系。

与土栈钱庄不同的是，由广肇旅沪商人设立的钱庄与同乡商人往来频繁，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商业伙伴。据记载，上海由广肇旅沪商人设立的钱庄 1920 年代有 2 家，即同泰钱庄、存德钱庄。

同泰由旅沪粤商谭同兴的后人创办。谭同兴（谭干臣）系沪上著名地产商，据说全盛时代曾拥资 1 000 余万元。19 世纪后半期，谭干

①②③④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信托业调查资料》，档号 Q275-1-1822。

⑤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

臣先后开设巨丰、巨亨、巨久等钱庄，因巨丰钱庄受辛家花园倒闭牵累，亏折过巨，无法维持，被迫收歇。受此巨创，谭干臣尝有言，不再涉足钱业。但民国初年，上海钱庄业步入兴盛期，其时谭干臣已去世，后人谭步韶经不住日新月盛的钱业的诱惑，由谭同兴号（即谭干臣原来所设字号，专营地产）经租部职员傅裕斋出面，集资设立同泰钱庄。同泰钱庄开办后一度营业相当顺利，年获厚利，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过收歇的命运。

存德钱庄，由粤人汪氏先人创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初为元字小钱庄，光绪七年（1881年），升为汇划庄。光绪卅二年（1906年）改组，加“和”记。1935年11月、1936年10月两次改组，股东略有变动，仍为合伙组织。该庄历年经营成绩极佳，各股东及客户存款常达一百四五十万元，抵押放款逾200多家。往来客户以广帮、绍帮为主。百分之九十的粤商与该庄有业务往来。同业评论：“上海自开埠以来，金融界时常因时局关系，发生倒闭风潮，而该庄如中流砥柱，百余年未受丝毫影响。”^①

银号与钱庄虽然名称不同，但无本质不同。银号的业务有存款、贷放款、货币买卖、汇兑等。由于从事贸易的旅沪粤商数量庞大，上海的粤资银号大多注重货币买卖和汇兑，以适应同乡商人的商业活动。

上海的粤资银号均由广肇商人开设，较著名的有道亨、泰和兴、大德昌等，在沟通沪粤、沪港、上海与南洋的经济交往中极其活跃。

道亨银号，广东中山人董仲伟创办，约于清末设在香港，资本为港币200万元，经营香港、广州、澳门、广州湾、昆明及其他各地汇兑，办理押汇、放款及一切银行业务。在广州、广州湾、越南海防、

^①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经营银行业务各商号调查资料》，档号 Q275-1-1814（4）。

上海设立分庄，董仲伟任总经理，上海分号经理董干文，系董仲伟胞弟，往来客户大都为广帮，约二三百户，存放款常达200万元。上海分号未设前，上海事务由泰和兴银号代理。^①

泰和兴银号，1929年始开办，资本20万元，大股东黄孔山、高可龄，均为广东人、香港富衡银号股东，甚为殷实。黄有资产300万元，高有资产500万元。另一股东施德之，为旅沪粤商。股东兼经理崔聘西，广东人，曾服务于上海大德昌、泰和昌等广帮汇兑号多年，资产虽不丰，但才具信誉甚佳。^②业务汇兑及存放款并重，在港、粤各地俱有代理行庄，无论电汇、信汇，便捷程度，均非其他广帮汇兑银号能及，交易极为兴旺，每年汇兑总额在1000万元以上。以粤汇居多。电汇大都托国华银行代汇。

广兴银号，1935年11月设于上海，股东王开林，原籍广东，生于越南庇能，向在庇能、新加坡等地经商。股东兼经理张佐衡，广东南海人，在宁波路利百川及大丰昌、大德昌等号任职多年，曾任广信银号经理，广信因亏蚀闭歇后，张佐衡即就原址另设本号。营业专代客买卖国外汇兑，以香港汇票为大宗，每日港汇买卖多至二三十万元。^③

广帮另有银号昌兴，与万兴纱号为联号。万兴纱号由郭庸卿创办，郭氏系广东番禺人，曾在香港等地任职，有从事银号经验。万兴纱号被誉为广帮纱号之首，1939年全年营业额约3000万元，营业数额大，透支及汇兑数额亦大，故设银号，专办纱号之汇兑及报关业务。^④

①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银行业调查资料（华商）》，档号 Q275-1-2100（4）。

②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个人信誉历史调查资料》，档号 Q275-1-1819（3）。

③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经营银行业务各商号调查资料》，档号 Q275-1-1814（4）。

④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棉纱业调查资料》，档号 Q275-1-1906（2）。

旅沪潮帮未见有银号组织，职司汇兑的有两类机构：一类系专营汇兑业务的汇票号，现在仅发现 2 家，即宏发、鸿大汇票号；^①另一类为兼营汇兑和杂货贸易的行商。在上海的潮商中，有不少这样的机构，这种特殊的商业、金融功能合一的组织在华南、香港、南洋潮商中普遍存在。实际上，香港、南洋的侨批局、民信局大都兼营汇兑及贸易。这一商业传统也被沪上潮州行商承袭。这类行商中较有实力者为广裕隆、裕盛源、郭乾泰行、德昌等，通汇网络遍及南洋，汇兑数额巨大，对潮商的跨地区、跨国经营起过重要作用。

广裕隆，总行设在汕头，申庄设在四川路腾凤里，合伙组织，主要出资者伍德如，以沪汕汇兑为主，兼办花纱、面粉等。^②

裕盛源，总行 1920 年代设在上海永安街永安坊，在汕头设有分号，资本 10 万元，以汇票为主业，兼办杂货。该号由乾泰隆、增源、高源茂 3 家潮帮商号出资设立。乾泰隆由潮州澄海人陈慈贇之父陈焕荣创设于香港文咸街。一般认为陈慈贇家族的经营重心在香港和南洋，很少有人注意这一家族集团在中国北方沿海口岸的商业活动。裕盛源在上海每年的汇票业务约 2 000 余万两，数额之大，足以与任何一家以汇兑著称的广帮银号相比。此外，该号每年还从上海各厂各商行采办杂货约 300 余万元，销往汕头和香港，业务量在潮帮杂货行中居头等地地位。^③

郭乾泰行，潮商郭若雨 1900 年前后创设，以販售花纱、杂粮等

① 宏发汇票号，总行设在上海，行址设在潮商麇集的洋行街，主营申汕汇票业务，由汕头汇票号佳发、广益隆等合伙组织，资本 10 万元。鸿大总行 1920 年代设于汕头万安街，上海鸿大为其分号，资本 12 万元，每年营业额约 150 万元左右。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外埠钱庄调查资料》，档号 Q275-1-1817 (3)。

②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外埠钱庄调查资料》，档号 Q275-1-1817 (3)。

③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百货业调查资料》，档号 Q275-1-1854 (5)。

为主业，兼营汇兑。全盛时期，郭若雨拥资百余万元，系潮帮殷实商人，先后为建帮海味行炳昌号行及源来行大股东。在永兴钱庄也有投资。后受炳昌、源来倒闭拖累，共赔累20余万。其设于汕头的多处商号也大多倒闭。郭乾泰行本为土栈，民国初年，改营潮州青赤砂糖、花纱、杂粮及汇兑业务。^①向以潮糖贩售为大宗，汇兑业务“远届新加坡、香港、西贡、安南等地”。在南洋有广泛的汇兑代理网络。^②

兼营汇票的潮帮杂粮商号还有仁诚行、德昌、南丰、隆记、义孚杂粮汇票号等。^③

在金融机构中，银行的业务最为齐全，对经济活动的扶助作用也最大。上海较有实力的旅居者群体，都建有以地缘资本为主的银行。据考，1930年代，上海可称作粤资银行的有4家，其中国华银行建行后，总行即设在上海，广东银行1942年改组后，以上海为总行所在地。东亚银行、香港国民储蓄银行的总行均设香港，在上海各设分行。国华银行1927年由邓瑞人、唐寿民、邹敏初、邹醒初等人发起，1928年1月27日正式开业。总额原定国币200万元，实际收足103万元。1931年7月资本收足230余万元。第三届股东会议决定改资本总额为400万元，1933年秋，自建大厦落成，迁入营业。1938年底，资本收足305万元。1940年底，股东会议议决，再增资200万元，改

①②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客帮申庄调查资料》，档号Q275-1-1851（1）。

③ 仁诚行，约于1890年代由谢鉴泉创立，初名仁盛，继改仁成，再改仁诚，股东10余人，以谢卓权、谢群权、明丰杂粮号、徐子青等占股较多。明丰杂粮号约于1900年代设立。徐子青为汕头连兴银庄大股东兼总理。以杂粮交易为主，兼营上海汕头间汇票。1930年全年杂粮营业额约七八百万至一千万元之间，汇票业务约四五百万元。隆记杂粮汇票号，民国初年设于上海天主堂街祥裕里（毗邻洋行街），由汕头人黄史瑛等合伙组织，以贩售杂货及汇票为业。杂粮等多购自牛庄、青岛及华北各地，销往汕头。汇票以申汕为主。档号Q275-1-1983（7）。

资本总额为 600 万元，至收足 500 万时，上海环境丕变，决定不再招收股款，即以 500 万元为资本总额。1944 年 3 月，改资本总额伪币 1 100 万元。抗战胜利后，资本调整为法币 830 万元。^①

关于创立缘起，该行谈到：“本行 1927 年由邓瑞人、唐寿民、邹敏初、邹醒初等发起，鉴于欲谋发展我国经济，非由联络华侨，吸收侨汇，以扶助国内工商业着手不可，因邓、邹两君在华侨方面都有相当信誉，而侨胞与之亦多联系，乃筹备创设本行。”^②

从吸收侨汇的目标出发，该行对华南业务相当重视，建行后，先后设立分行 10 余处，其中香港、广州、汕头各 1 处。^③

曾有人把国华银行视作侨资银行，这是不准确的。^④该行成立后，董事长邹敏初于 1929 年亲自率队赴新加坡招股，此行成绩，总计新加坡、庇能、麻六甲及麻坡、麻都巴合、吉隆坡等地 37 名华侨商人认股 11.63 万元。^⑤1933 年，邹敏初再次携副经理李某“经历马尼拉、新加坡、吧城、仰光各大埠，调查经济状况，并接洽股款，各地华侨商人认股约 30 余万元，其中已缴股款计十四五万元”。两次南洋招股，实收股款 25 万余元，在资本总额实数中所占比重，仅四分之一强。^⑥

广东银行，民国元年设于香港，上海分行 1916 年开办。资本额

① 《国华银行档案》：《国华银行简史》，档号 Q278-1-423。

② 《国华银行档案》：《本行简史组织沿革》，档号 Q278-1-423。

③ 1929 年春于苏州、南京各设分行，秋间又设广州分行。1930 年 1 月在上海本埠新闻、虹口两处各设分行，秋间又设南市分行。1932 年秋设厦门分行。1933 年冬在本埠添设八仙桥分行。1934 年于天津、青岛、常州及本埠静安寺各设分行。1935 年设北平分行。1938 年于香港设分行及总行驻港办事处。1947 年将广州分行惠爱路办事处迁移汕头，汕头分行于 1948 年 6 月开业。

④ 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第 323 页，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⑤ 《国华银行档案》：《增收股款情形》，档号 Q278-1-9。

⑥ 《国华银行档案》：《徐董事往南洋接洽股款情形》，档号 Q278-1-17。

定为1100万元，实收866.56万元。由陆蓬山发起。总行开办后不久，即在广州设立分行，董事、股东大都系港澳巨商。营业注重海外华侨，经营情况一度甚佳，历年盈余，至1932年底止，公积金达港币115万元，不幸于1933年以世界经济不景气，亏损至巨。1935年9月4日，终以营业不振，宣告停业。1936年清理后复营业。^①广东银行上海分行1935年前营业并不理想，难以获利，复业后，该行一定程度改变了营业方针，强调上海地位的特殊性，上海分行的业务也跃居总分行之首。

华商企业多半由家族及同乡商人合伙投资，对上海粤籍金融机构股东身份的考察显示，粤商与其他华商商帮并无不同。为便于业务拓展，上海粤商充分利用血缘、乡情等社会资源，从而为建构跨省、跨国的金融网络，大力推进沪粤港等地的业务奠定了基础。

国华银行是一家有复杂背景的银行，股东以同乡商人为主，也有少数闽籍侨商，不仅有商人，还有一些声名显赫的政要。

董事长邹敏初是该行的主要发起人，曾任广东中央银行行长、广东省财政厅厅长，系广州著名银号恒济银号店主，在香港设有恒泰银号、岭东银公司、国丰银业公司等，在粤港金融界有绝大势力。国华银行和陈济棠的关系非同一般，陈济棠通过邹敏初控制国华。国华银行的档案介绍邹敏初的背景时指出：“邹敏初所代表之股份，一部为南洋各地之华侨，一部为粤中之商人，一部为第四军集团之亲友。”邹敏初与第四军有长期资金交往，1934年因债务纠纷，银号被第四军封闭，但这并没有终止陈济棠对国华的控制。据1950年一项对国华银行中官僚资本状况的调查证实，陈济棠（在股东名册中以别名“陈伯南”登录），持有2472股，陈氏亲友陈树炳持412股。股东中

^① 《上海中国征信所银钱业调查》(4)，档号Q275-1-2291。

其余陈姓亲友及何应钦家属、邹鲁家属等还有多人。^①

国华另一发起人邓瑞人曾任十九路军财政官员，与蔡廷锴等人关系素密。邓瑞人所代表“一部为港粤中之商人，一部为十九路军官之亲友”。邓瑞人在国华以堂名人有股款5万元。因邓瑞人的关系，国华得以在十九路军的驻扎地福建顺利开展行务，十九路军的金融业务长期独授国华，仅“一·二八”爆发后，海外捐给十九路军官兵的汇款就在百万元以上，全部存入国华银行。国华也给十九路军官兵以种种便利和优惠，如对十九路军的汇款一直免收汇水。^②国华与十九路军的特殊关系，引起国民政府的极度猜疑，福建事变后，国华被查封，后以邓瑞人辞去国华常务董事，才解除封禁。

国华其他董事也多为粤省政界、金融界名人，出任过多项重要公职。如常务董事邹殿邦曾任广东省全省商会联合会主席。沈以甘，广东大埔人，广东省银行行长，三水、封川县长。

唐寿民是国华银行另一有影响的人物。唐虽非粤人，但在金融界交游甚广。建行之初，唐联络了部分南洋华侨，投资国华。1933年4月，唐任职国华5年后，因交通银行力邀，改任交通银行总经理，由此，国华与交通银行发生特殊关系。唐任职国华期间，还曾利用与金城银行周作民的良好关系，说服金城承受国华5万元股份。^③

从发展华南和侨汇业务的目标出发，国华银行除安排不少华南政界要人和金融界、商界头面人物进入董事会之外，还拉拢了不少广州的银号主和杂粮行店主。据某年国华董事会股东名单，21名广州、汕头、香港股东中，16人分别为香港恒泰、广州恒济、成发、德泰、

① 《国华银行档案》：《遵令办理查报本行官僚嫌疑之股份提请公同检讨案》，档号 Q278-1-36。

② 《国华银行档案》：《厦门分行卷》，档号 Q278-1-128。

③ 《国华银行档案》，档号 Q278-1-113。

诚济、广信、阜源银号的店主或股东。^①银号在广州汇兑业中处特殊地位。显然，众多银号主的加盟，对国华推广发展华南的汇兑业务是有利的。

广东银行同样充分利用了同乡中的政治资源，以便复业后有一个全新的气象。兹就宋子文与广东银行的关系作一分析。

宋子文以其特殊身份，对华商银行多有染指，知情者多能言之，但宋氏入主一些银行后，确实成为某些金融机构的宝贵资源。以广东银行为例，该行1935年因国际金融暗潮，难以捱过，不得已宣布清理。重新开张后的广东银行宣布由宋子文任董事长，宋氏虽坐享其成，但确实利用其与中国银行和其他银行的特殊关系，为广东银行的重振，提供了帮助。据宋子文言，出任广东银行董事长前，宋氏曾与中央、中国、建设银公司等银行机构接触，定有合作意向，三大金融机关“荷允尽量帮忙”。这对该行“此后业务上之推进，资金之调拨，均有莫大之便利”。^②上海金融界有一个习惯，行庄新开张，有交情的同行须于当日存入钱款以示相助庆贺和支持。1936年广东银行重新开张当日，沪上多家银行纷纷送来存款，该行职员虽然早有准备，但存款数字之大，仍然出乎许多员工的预料。据报，短短数日，新开张的广东银行收入存款1300余万元，^③其中中国银行存入300万元。后来，中国银行又允许广东银行透支使用这笔存款，以150万元为限，仅取息2厘，只及其他银行利息的一半。^④有了这笔低息巨额存款，广东银行得以大胆主动地展开各项业务，直到数年后根基已固，

① 《国华银行档案》：《国华银行董事会股东名簿》，档号 Q278-1-416。

② 《广东银行档案》：《董事长报告·广东银行会规程草案》，档号 Q65-2-70。

③ 《广东银行档案》：《广东银行董事局宋董事长宋子文先生宣言》，档号 Q65-2-66。

④ 《广东银行档案》：《广东银行香港总行函卷》（“为中国银行往来办法已届满一年如何之处祈核示由”），档号 Q65-3-57。

才由沪行将款还清。显然，如果没有宋子文的巨大影响，广东银行的重振会困难得多。

二、粤资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

1936年，宋子文在其以新任董事长身份发表的宣言中表示：“粤人在沪及长江一带经商，已有远大深长的历史，享有良好的信誉与势力，本行名为广东银行，顾名思义，深愿随诸先进同乡之后，通力合作，发扬而广大之。”^①私下宋子文又对总经理邓勉仁指示：“本行为广东人对国内外发展金融之机关，宜向中下级社会多事联络接洽，吸收存款以增信用。”^②邓勉仁也曾对下属表示：广东银行“以协助广帮发展为职志”。^③

宋子文的宣言，清晰表达了广东银行以旅居上海及其他口岸城市同乡商帮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意愿。

1840年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沿海口岸逐批开放，素有向外发展传统的南中国海沿海人民纷纷外出，寻找新的生活机会。上海是粤民最为集中的外省商埠。经过多年经营，至1920—30年代，广东旅居者已成为上海经济势力最强的社群之一，在上海的纺织、卷烟、环球百货业的地位举足轻重，在沿海贸易和进出口贸易领域影响更大。据统计，1920—30年代，粤商开设的贸易商号至少有500家，分别从事上海与华南、上海与欧美（包括日本）、上海与香港、上海与南洋的进出口贸易。粤商在北至日本神户，南至印尼棉

① 《广东银行档案》：《广东银行董事局宋董事长宋子文先生宣言》，档号 Q65-2-66。

② 《广东银行档案》：《广东银行 1936 年第二次行务会议》，档号 Q65-2-68。

③ 《广东银行档案》：《总经理来函》（“为请尽量接受在港贱单之押汇业务由”），档号 Q65-2-8。